

义和团源流浅探

陶柏康

关于义和团渊源问题，也是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最近李世瑜同志提出了一种新看法：“义和拳或义和团只是一种拳术的名称，后来则用以称练这种拳术的人所组织的武术团体，它是民间的一种秘密结社”。从而否定了义和拳起源于白莲教的传统看法。但是，读后尚觉意犹未尽，故再申述一点浅见于后。

过去史学界的传统看法都认为，义和拳起源于白莲教。造成这种错觉有两个因素。第一，有关这方面的史料记载甚少，第二，清末吴桥知县劳乃宣曾经写过《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文中提出了义和拳起源于白莲教的结论。从此，陈陈相因，似成定论，其实这是不可信的。

劳乃宣提出义和拳即白莲教看法的史料来源是嘉庆十三年（1808）清仁宗颙琰的上谕和嘉庆二十年（1815）直隶总督那彦成的一通奏折。那彦成在奏折中写道：“又青县季八、叶幅明等练习义和拳一案。又青县边二从习白阳教预知逆情一案。景州葛锡华等从习离卦教一案。荆州刑士魁等传习如意门，搜获妄造表名卦号总册一案。故城县葛立业传习义和门拳棒预知逆情一案。均经讯明，教名虽别，俱系离卦教之子孙党徒”。因为离卦是八卦的卦名之一，而八卦教又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所以劳氏就将其主观相联，进而作出结论：“义和拳一门，乃白莲教的支流”。劳乃宣并没有对义和拳的源流作过深入的考证。因为仁宗的上谕写于嘉庆十三年，那彦成的奏折写于嘉庆二十年，而义和拳至迟产生于清初。从清初到嘉庆十三年前后时间相距一百几十年，因此，嘉庆年间义和拳与白莲教的支派相融合，只能说是义和拳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间秘密结社的交汇。那么，劳乃宣为什么要强调义和拳是白莲教的支派呢？关键在于白莲教历来是清政府所严禁的“邪教”，如果把义和拳判为源出自白莲教，那自然是属镇压之列。这就是劳乃宣的用心所在。对此劳氏本人也是直言不讳的。他在《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说：“若知其本为应禁邪教，谁肯信而从之以身试法哉？”他还向清政府献策，“将其实系邪教，久奉明禁缘由，显为揭破，严切禁止，如有犯者，必定执法严惩，决不姑息”。劳乃宣的这两段话反映了他对义和拳的恐惧和仇视。可见以劳乃宣的结论来给义和拳的渊源作判断实在是不可取的。

诚然，义和拳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和白莲教的支派有汇合的趋势，义和拳组织后来在改名为义和团时还借用过八卦教的几个卦名，诸如乾字团、兑字团和坎字团，但也借用的不全。支碧湖在《续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一面附和劳乃宣的观点，一面又为难地承认：“要之称为八卦，予所见者仅乾、坎、兑三门”。当时还有人说“义和团自五月中旬进城，迄今一月有余，在京城各乡各团的有千起，皆乾，坎二门，若八卦教会，尚有震艮等六门，何仅此二字，殊为不解”。这种组织名称不俱全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义和团只是借用八卦教的教名，而不是源出于八卦教。

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事实可以引为证据。据记载，义和团的一些组织在北京城内的揭帖

中公开声明自己是“非白莲”的。事实上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曾经被清政府利用来镇压过白莲教，据记载“庚子年（1900）北京五月十七日，今日刑人于市，计男妇老幼七十八名，先是根据义和团云：‘烧某教堂时，搜出纸人纸马，秘访得白莲同天主教将于八月十五日起事谋叛……捕获七十八名，送交提督衙门’”。“民团拥护至法场”，“帮同行刑”。五月二十一日，“又斩白莲三十余人”。尽管这类事发生在义和团被清政府利用之后，但他们毕竟参与了镇压白莲教的活动。他们自己都否认义和团与八卦教有血缘关系，怎样能说义和拳是起源于白莲教呢？

寻根溯源，义和拳是在清初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产生的、以“保全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团体。

资产阶级为什么没有联合义和团

钱艺艺 谢维卫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狂飙突起，资产阶级各派曾企图利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去实行自己的主张。但这一良好愿望却没有实现。是资产阶级不需要和农民联合吗？当然不是。其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改良派日暮途穷，同时也是兴中会革命活动极其艰难困苦的时候。资产阶级和顽固的封建势力、强大的帝国主义相比，它的力量太微弱了。列宁曾深刻指出：

“亚洲这个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主要代表和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可见，能否联合农民是资产阶级革命成败的关键。是这种联合的可能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存在吗？也不尽然。分散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农民已经在义和团的旗帜下集合起来。资产阶级要推翻清政府，主要地应当去发动和依靠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爱国志士们眼见得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割土分疆，无不忧心如焚，奋起大声疾呼挽救民族危亡。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农民、手工业者的地位大不相同，他们和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反帝是不彻底的。所以他们的言论比行动激烈，正式的政见又比日常的宣传鼓动更温和得多。

农民把帝国主义看作是民族的大敌，而资产阶级则把帝国主义看成先生。他们幻想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推翻清政府，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据说，当时有革命党人秦力山只身到了天津，求见拳党大师兄，提出联合起来革命排满的主张，结果被“拳党斥力山为二毛子，命牵之出。”于是秦力山只好放弃了合作的想法。把革命党人看作“二毛子”固然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反映，但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农民对资产阶级自发的不满，表现了这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在对待帝国主义态度问题上的冲突。因此，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如果资产阶级要去联合农民，必须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把反帝作为自己的革命任务，这两个阶级才能有共同语言。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活动中，反满和反封建思想是组织在一起的。当看到义和团被清政府“控制”和“利用”的时候，他们把它和清政府一起加以反对。当然谈不到联合。

康梁保皇党人是仇视义和团运动的。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和保皇党相比，与封建主义的